

艺术与爱情

刘晓庆

ART & LOVE by LIU XIAOQING

世纪实文学丛书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刘晓庆

艺术与爱情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先法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艺术与爱情

刘晓庆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5 摄页 4 字数 106,000

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4,000 册

书号：10078·3810 定价：1.35元



她渴望获得人生的价值



恬静中透露出秀美

随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香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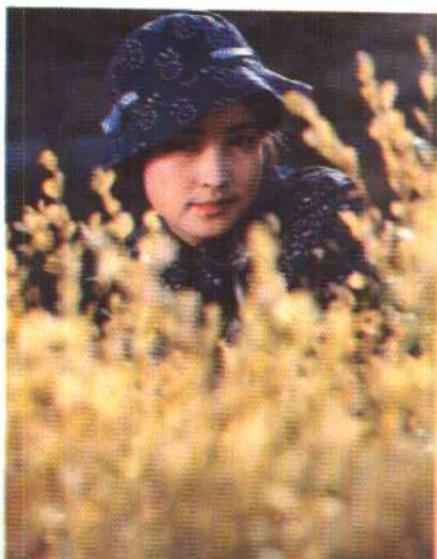




扮演《原野》中金子

她时刻思考着下一部作品

繁花似锦的前程令她神往





表演日本舞蹈



和相声演员姜昆夫妇在一起



刘晓庆和余之合影

艺术给她带来无穷的乐趣

在青松丛中留一张倩影



关于中国影星传记文学的思考

(代序)

余之

严格地说，中国影星传记文学，是一块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。在这块寂寞而荒僻的土地上，我们几乎看不到艳丽夺目的鲜花；几乎闻不到令人心醉的芬芳。偶然，我们也能看到一、两本有关影星的传记或回忆录，但它们如同传自远方的一、两声雁鸣，声调那么细弱，形影那么孤单，而且很快地，在一片嘈杂的噪声中消失了……

影星传记文学，作为纪实文学的一种，在国外，已成为深受读者欢迎的流行文体。其受欢迎的程度并不亚于畅销的文学读物（如侦探、言情、推理等作品）；影星们——无论是老年的、中年的、还是青年的；也不论是蜚声世界影坛的，抑或初露锋芒的，都习以为常地、迫不及待地、几乎不作掩饰地撰写自传、回忆录。品种之多、样式之丰富，是令人喟叹的。自传、评传、他传、传记小说、日记、书信……思想之活跃、文体之解放、色彩之跌丽，无不使人耳目一新。从数量

有限的中译本来看，我们已经读到卓别林、劳伦斯·奥立佛、英格丽·褒曼、费雯·丽、索菲亚·罗兰、山口百惠、高仓健、田中绢代等一大批为中国观众所熟悉的外国影星传记；尚在翻译、即将出版的还有简·方达、琼·克劳馥、佩蒂·黛维斯、玛丽莲·梦露、克罗斯·金斯基、伍迪·艾伦、阿伦·狄龙、邦达丘克……当今走红的一代国际青春影星，如娜塔莎·金斯基、斯特里普、波姬·小丝、菲比·凯茨……也越来越为写作界所注目，各种零星的小传、传略也开始介绍进中国来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她们也会有一批各呈风采的自传、他传、评传出现，这是肯定无疑的。

和国外影星的传记文学相比，中国影星的传记文学显然是大大落后了。

虽然，电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，它的创始，也不过是近百年的历史，电影传入中国，也是本世纪初的事。但是，它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样式，它在我国现代与当代文艺史上，有着极其光辉夺目的一页。它是中国艺术宝库中一颗光焰夺目的明珠。它，不仅诞生了不胜枚举的优秀作品，而且也哺育了一大批深受我国人民喜爱的电影风流人物。几代影星，在我国人民的心目中，有着美好的、传奇的印象。他（她）们的艺术、生活道路，成为人们热衷的话题；他（她）们中的不少人，已成为青年男女心目中的偶像——他（她）们拥有广大的观众基础。

在国外，一位有成就的电影明星拥有三、四本传记，是司空见惯的事。它们有的侧重于生活道路的记述；有的侧重于艺术形象的总结；有的则两者兼而有之。这些传记为

充实电影史，研究个人艺术成就，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背景材料。是非常珍贵和必要的。

在中国，也拥有一批中外闻名的影星，虽然，他们的知名度在全球范围内还很有限，但是，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，随着中国与日俱增的对外开放，他们中的相当一些人，无论是三、四十年代的老一代影星，还是新成长起来的新星，在海外，拥有的观众群也越来越多。为电影事业的繁荣与发展，也为了更好地记录个人的艺术成长史，他(她)们应该撰写自传；著作家、评论家们也同样应该研究他们，以帮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撰写传记与评传。

然而，中国影星的传记文学，迄今为止，几乎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。

中国影星传记文学，是一个具有强烈诱惑力的、且有极大的发展余地的领域；它是一个迫切需要受到电影界、文学界重视和解决的新课题。这块肥沃、丰腴、具有很大潜力的处女地的被开拓、被耕耘，预示着我国纪实文学的一大突破、一大解放。但是，阻力是强大的。

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举出一些已经离开人世的影星的名字：石挥、赵丹、金焰、阮玲玉、周璇、魏鹤龄、上官云珠……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有成就的尚健在的影星的名字：白杨、王人美、秦怡、王丹凤、张瑞芳、孙道临、黄宗英、吴茵、黎莉莉……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风云当代影坛的著名中、青年影星的名字：杨在葆、许还山、王心刚、达式常、刘晓庆、潘虹、斯琴高娃……无论是生者，还是死者，他们完全有理由拥有一本，甚至两、三本自传、评传。然而，遗憾的

是，关于中国影星的传记却寥若晨星。不少影星在世之日，也梦想写写自己的生平，让岁月的记忆诉诸文字，安慰一下晚年的孤寂的心灵，但他们终于没有做成，成为一桩永远也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那么，是什么影响和阻碍着中国影星传记文学的开拓与发展呢？

寻找个中原因，并不是能用一、两句话说得清楚的。这是一个由多方面的综合因素而造成的。其中有传统习俗的偏见；也有狭隘的文艺学观念；既有来自于外界的错误舆论；也有来自于影星自身的心理障碍。

青年影星刘晓庆的自传体作品《我的路》的发表，以及围绕着这部作品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反响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。

刘晓庆，是近年来出现在我国影坛的一颗新星。她在银幕上所创造的不少女性形象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和许多人才的成长一样，她的每一步都凝聚着辛勤的汗水，围绕着她的艺术道路、她的生活、她的爱情，都经历了起伏跌宕的波折与坎坷。《我的路》是她艺术与爱情生活的记录；是她饱尝了艺术与爱情的酸、甜、苦、辣之后的心灵的写照。《我的路》的写实风格，无所顾忌、毫不回避的直泻，以及洋溢着激情的文采，成就了它一定的社会价值和认识价值。

和她本人不是十全十美的一样，《我的路》也不是十全十美的，但这本传记作品所显示出来的作者的勇气与胆识，以及它蔑视传统的文风，是令人钦佩的。

《我的路》之所以能引起海内外读者的广泛兴趣与注

意，正鉴于这部传记作品诞生在封建残余思想渊源流长的土地上；诞生在影星传记文学的沙漠中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我的路》在中国未被开垦的影星传记文学处女地上，长出的一棵有顽强生命力的仙人掌与格桑花。

我们并非有意过高地估价它的价值，但是这部作品的地位及其他开拓性意义，是显而易见的。

有人说是刘晓庆太年轻，不够写自传的资格。许多三、四十年代，以至五十年代的著名影星尚且还没有写，她怎么能立传呢？

在这里，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所谓立传的年龄标准问题。长期以来，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“左”的思潮是非常流行的。在“左”的思潮的影响下，人们把“传”看得十分神秘。只有死人加伟人，或者是活人加神才能“树碑立传”。政治生活领域内的“左”的思想流弊，自然也波及到了文艺领域。虽然不能说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传记文学的形式为之写传，但也不能对哪些人能写传、哪些人不能写传，作出一个机械的算术式的规定。年龄更不能成为能否写传的一个判别。就中国的影星而言，老一代的已故影星，他们生前为中国的电影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，他们的艺术实践是一笔可贵的财富。传记文学作家的笔触理应追踪他们，艺术地再现他们的生活艺术之路，传授给后来者。现在还活着的影星，是中国影坛的名将之花，趁他们健在的时候，应利用有利条件，抓紧时间加以总结；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影星，由于时代不同，条件不同，他们在短短的几年里所取得

的艺术成就，就某些方面来说，也并不亚于他们的前辈。他们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，结合特定时代所造成的特殊的艺术、生活之路而加以总结，对今天八十年代的青年的成材，无不具有启迪和借鉴作用的。对于他们撰写自传，或者人为之写评传，也决非是一件怪事。我们应当欢迎他们这样做。但事实并不完全如人所愿。

不一定是成功者才能写传，失败者难道不能写传么？不一定是不犯错误的完人（完人是没有的）才能写传，有缺点、错误的人就不能写传么？不一定是死去的伟人才能写传，活着的凡人就不能写传么？结论是不言而喻的。

传记文学既不是“死人文学”，也不应是“过滤文学”。

可以称得上“过滤文学”的传记，其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涂饰。传主与立传者不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，而是以狭隘的实用主义的眼光来对待自己所走过的道路。对待历史史实，不是客观地追述，而是删枝砍干，采取回避、隐瞒的不严肃态度。对己有利者，则取；能赶时髦者，则用。他们违背了一个最根本的原则：真实，是传记文学的生命。

传记文学应当写人。看上去，这是一个荒唐的命题。有人会诘问：“传记文学不写人，还写什么？”但是，有些作者却往往有意地在涂饰人的历史，把现在看来某些“不光彩”的、但对其思想发展不可缺的要害部分隐去。人是复杂社会的分子，他们的成长不可避免地打上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烙印，作为一个人的成长与进步，难免会沾上人世间的尘埃与污浊，这是可能的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写出世间的纷争与恶浊，写出从黑暗的铁屋中的奋起，这是真实的，令人感

·动的。相反，则是不可信，不可爱的。

中国的影星和其他战线的知识分子一样，由于动荡的政治、社会的因素，也经历了极其复杂的人生道路。有难堪、有不幸、有追求、有热情……诸如种种，才有声有色、有血有肉地构成了一个大写的“人”。有的影星在旧中国，在他（她）年轻的时候，参加了一些反动的、落后的社团，参加演出了不好的戏，就是在他（她）们的爱情生活历程中，也是充满着矛盾、悲欢，多次离合；有的则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动乱中，拍过为“四人帮”那条政治路线服务的电影，等等。这是历史，是用无形的文字“发表”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我们应当正视它，而不是回避它。写出它们意义的全部，从中看出一个真实的人的思想脉络与发展道路，是一部有生命的传记所不可缺少的。

这个思想障碍不突破，就难以创作出真正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中国影星传记来的。

一个名叫韦尔斯的外国传记文学评论家说过，传记文学应“把一切矫饰剥去为己任”。又说：“一个人的传记应由一位认真的敌手来写。”“敌手”当然是一个强化了的概念。写作中国影星传记不需要什么“敌手”，只要传记作家确实做到“认真”二字，传记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的。

真实与涂饰，求真与徇情，始终是传记文学的一对矛盾。有志于传记文学的作家应当作出自己正确的选择。

传记文学不是“过滤文学”，但它也不是史记。如果，传记作家只是一味地将素材加工成闪光的珠串，用回避历史

事实的作法来制造迷惑人的光环，那么，传记文学在真实性方面就会走入歧途。相反，传记作家仅仅满足于史料的堆砌，停留在“属辞比事”上，那他在传记文学的艺术性方面也是不成功的。

传记文学，既是传记，又是文学。它在植根于真实性的基础上，应当具备文学的某些特征。例如：借助于形象思维展开丰富的想象，而且在语言方面要富有文学色彩。它不仅应当具有历史价值，还应当具备文学价值。如果，一部本来应当按照影星丰富多采的生活经历，而写成的跌丽多采的影星传记，只是满足于生平的考证，作品年表的罗列和分析，那只能是适合电影研究工作者阅读，而很难拥有广大的普通读者群的。

我们所说的影星传记写作中的“形象思维”和“丰富想象”的运用，基于两条：可靠的史料作依据和不违背人物性格的逻辑，以及具体的历史环境。茅盾在《我走过的道路》一文中，谈到了他写回忆录的原则：“所记事物，务求真实，言语对答，或偶添藻饰，但切不因华失实。”这段话，实质上涉及了传记文学应具备“华”与“实”两个元素。“华”者，文学性也；“实”者，史料性也。不因华失实，不因实而弃华，这两条应当是辩证的统一。至于“藻饰”的范畴、程度如何，只要在不失实的基础上，各个著家各有发挥，或言语对答，或场景描绘，或气氛渲染……难以作死板机械的规范。

在世界文学范围内，文学巨匠们的传记要比电影人物的传记产生得早。因此，在写作风格上，文学巨匠们的传记比电影人物传记显得更丰富多采。文学巨匠们的优秀传记，

为中国影星传记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。

在众多的有关但丁的传记中，意大利著名作家马里奥·托比诺撰写的《但丁传》（原名《金发美男子》）一书，是比较出色的一部人物传记作品。可资写作影星传记的著家们参考。在意大利，关于但丁的传记，自薄伽丘撰写《但丁传略》和勃鲁尼撰写《但丁生平》的六百余年来，各种版本的但丁传作，不胜枚举。但多数侧重于生平考证与作品分析，文笔虽严谨，但缺乏文学色彩。但马里奥·托比诺的《但丁传》却与众不同。他写作的《但丁传》基于以下三点：一、可靠的历史资料；二、借助于形象思维；三、运用富有文学色彩的语言。可以说，他是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写作风格来完成《但丁传》的。由于这部著作将史料与文学紧密地糅合在一起，受到了意大利广大读者的欢迎。作品出版后，一版再版，被评论界誉为“一部杰作”，并编入意大利教科书内，成为青少年必读的一本通俗读物。

马里奥·托比诺写作《但丁传》的三要素，可以成为我们撰写中国影星传记可资借鉴的原则。我们某些人物传记，有一个共同的通病，史料大凡经过一番“过滤”，缺乏形象思维，且语言拘谨呆板，缺乏文学色彩。这样的人物传记读者当然是不会满意的。

写好中国影星传记，除了将史料与文学紧密地结合起来之外，处理好传主与著家之间的关系是至为重要的一环。

记得一位传记文学评论家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每一个传主的生活，都会给予作者有利的条件和特殊的困难，所以独创性在作者的作品中要起很大的作用。”

这句话是很有辩证法的。细细品味这句话，其包含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。

就中国影星而言，著者在采访、写作过程中，传主所给予的配合程度，取决于传主对于著者的信赖、友谊的程度；而这种信赖与友谊的尺寸，又决定传主所提供的生活的准确性。一般来说，传主总依照自己的好恶来提供生活的素材，或褒或贬，或吐露或隐藏，无不烙上传主强烈的主观色彩，因此，作为著者不应该单纯地成为传主素材的记录员、复印者，更应该具有缜密调查的功底和独立思考的能力——独创性将决定影星传记的成败。从传主提供的生活线索、艺术脉络的便利条件中，在卷帙浩繁、年代历久的特殊困难中，逐渐清晰地梳理出一条比较符合传主生活真实、历史真实的本相，这是一个成熟的传记文学作家所必须具备的。

弗兰克·弗莱德撰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传记时，处理了四十吨的文件材料；罗曼·罗兰写作《贝多芬传》时，足足参阅了十页之多的参考书目，以及日记、著作、各类传记和画像等，最后以历史学家的严密和诗人的想象，终于完成了一部脍炙人口的不朽名著。许多文学巨匠们的传记写作，为我们的传记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借鉴。

在国外文学界，优秀的人物传记已经向小说过渡。传记小说，已成为纪实文学领域内一种新崛起的文学品种。这种传记小说，当然不是著家凭主观的臆造作漫无边际的扩张与想象。它仍然立足于人物基本史实的基点上，对人物的心理活动，甚至细节作必要的、适合于历史环境的加工与